



【拒绝流行】调查记者

调查记者是用来怀念的，就像故乡一样。报纸是内容的故乡，而调查报道又是报纸的故乡，媒体业弥漫着一种nostalgia。每当某个公共危机引发某种焦虑时，调查记者都会被招出来吊吊一番，公众借此批判当下，媒体人以此表达不满，当了大企业公关的前记者们，借机缅怀一下那个黄金时代的光辉岁月。《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》一文刷屏后，《别假装爱调查记者》一文怒怼：你们把给调查记者哭丧的文章转到了十万加了，你们这帮“新故事会”的阅读受众，还能记得原材料制作者——那些调查记者的名字吗？你们爱的是剪辑师，爱的是剪报者，爱的是书童，哪里爱调查记者啊。调查记者濒临灭绝，是社会各色人等的一场合谋，写的没前途没尊严，管的不让写，看的不爱看，抄的一窝蜂。——骂得很难过，句句戳心，一针见血，直指现实。

调查性报道作为一种文体的兴起，是从美国开始。进步主义时代的扒粪运动使调查报道获得了一种道德光环，水门事件和越战报道更在这个行业的年轻人中激发了一种“成名的梦想”。伍德沃德和伯恩



【昙花的话】汤

去年，在秋风乍起时，到亚美尼亚旅行。我发现当地人钟情于汤，汤品种繁多。下榻于民宿，房东莎莉诺每晚熬汤，我呢，坐享其成。牛肉汤、鲜鱼汤、芦笋汤、马铃薯汤、黄豆汤、番茄汤、胡萝卜汤、南瓜汤、蘑菇汤，等等，天天不同，变化多端，我喝得眉开眼笑。

称赞莎莉诺泡汤的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可是，实事求是的她，却一板一眼地应道：“我们喝汤，只为求存。亚美尼亚山地多，气候寒冷，晚上喝下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汤，便不会冷得那么难受了。”

说得也是，现在，才刚入秋，可气温却已降到5摄氏度，冷得簌簌发抖的我，把一大碗罗宋汤咕噜噜地喝下去，缠绕在五脏六腑的烟气，立刻驱散了爬满一身的鸡皮疙瘩……

在家里，我也常常熬汤。然而，处于赤道地带的新加坡，终年是夏，我熬汤，不为暖身，只为暖心。

在圆肚的瓦锅里放入老母鸡、干贝、火腿、红枣和枸杞，慢火熬煮。原本各自为政的汤料，在火力的撮合下，渐渐渐渐地合为一体，如雾般散开的烟气，氤氲着致命的浓香，即连安定若素的眉毛都被香气熏得飞了起来。

朦胧的黄昏在门前铺出一条灰色的地毡，疲惫的人自归归来，跌入了由香氛织成的那一张柔软的大网里，压力去了、焦躁没了，整颗心变得像汤一样的平滑柔顺。

汤碗不大，可是在感觉上，它比井更深、比海更阔，因为在那香可蚀骨的浓汤里面，藏着浩浩瀚瀚的亲情；无可替代，又无法仿制。



洪子诚、陈思和的两部当代文学史著也有不足 当代文学如何写史？

□陈剑晖

理想的当代文学史样板

A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三次高潮

1957年，由高等教育部审定的《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》的颁布，标志着“中国现代文学史”学科的成立。而在文学学科建设中，文学史写作一般处于较高层次的地位。它既是对作家的定位确认，也是对各种文学现象的梳理、归纳、总结与“历史化”。同时，在中国大学文学教育及课程教学体系中，也一直以“文学史”为教学中心。所以，长期以来，文学史建构一般被视为学科是否稳定，是否成熟的标志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虽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开始复苏，并从“中国现代文学”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具有独特内涵和鲜明个性的学科；同时，一批文学史著作的出版，也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正式建立。但是，也有人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远远落后于现代文学史。更有一些著名的文学史家对当代文学能否写史提出

质疑。比如唐弢先生在那篇著名的文章《当代文学不应写史》中，就开宗明义指出：“我以为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的。”

当代文学写史的第三次高潮，也是当代文学学科相对成熟的时期，应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。这时期出现了洪子诚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，陈思和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两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。其他较有影响的还有于可训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略》，陈晓明的《中国当代文学主潮》，孟繁华与程光炜合著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》，董健、丁帆、王彬彬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》，等等。

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另一种类型，是当代文学思潮研究，这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另一门“显学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新时期以来，关于当代文学思潮方面的专著有几十本之多，其

中较有影响的有朱塞的《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》，何西来的《新时期文学思潮》，宋耀良的《新时期文学主潮》，陈剑晖的《新时期文学思潮》，陆贵山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思潮》等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迄今为止，中国当代文学史已有几百部之多。虽然数量庞大，但有个人色彩和独到见解、令人满意的当代文学史著并不多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教材型的文学史占了大部分。二是观念和体例陈旧，大多数文学史采用了“编年史”的写法，且千篇一律，陈陈相因。三是长期以来，意识形态的叙述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主导因素。四是有的文学史只是资料的堆积，缺乏批评的眼光和理论的穿透力；有的文学史虽有批评眼光和理论意识，但又缺乏扎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支撑。正是上述诸方面的不足，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远未达到人们的期望。

B 洪子诚、陈思和著作并非完美无缺

优秀的当代文学史，如洪子诚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与陈思和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。这两部史著被公认为当代文学史写作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标志性著作，好评如潮，而且呈一边倒态势。

但依我之见，这两部广获好评的文学史著并非完美无缺。洪子诚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不足在于：一是从总体看，洪著尚未能完全摆脱自王瑶以来的意识形态叙述，这样必然导致“17年文学”与“新时期文学”在叙述上存在着某些割裂现象，而他将台港等地区的文学排斥于“中国当代文学”之外，则体现出该著在学术视野上还不够开阔圆

通。二是经典的缺席。洪著虽然挖掘出一些过往被掩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，但在这本文学史著中见不到经典与大家也是一个事实。造成“经典缺失”自然有诸多原因。但一方面秉持“价值中立”的立场；一方面面对优秀作家作品时又过分谨慎、权衡与犹豫，不敢大胆地行使文学史家的权利，为当代文学命名认定，恐怕是更为主要的原因。这与现代文学史中确立的“鲁郭茅巴老曹”的文学排序，相差何止一万里。三是学术与审美趣味上的厚此薄彼。读过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的人可能会注意到，洪子诚对“老土”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“有所保

留”，如此一来，像陈忠实、路遥这一类偏向现实主义方法、相对较传统的作家自然便被冷落到一边，甚至被排斥出文学史之外。在文本分析方面，该著并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。

陈思和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的文本分析中规中矩，没有硬伤，也没有剑走偏锋，但同时文本分析也缺乏深度和个性。尤其值得商榷的是，陈思和选择作家作品入史过于草率随意。举例说，在王蒙这一节，他选择了《海之梦》。在张贤亮这一节，则是《邢老汉与他的狗》，而稍微了解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，这两篇作品并不能代表王蒙、张贤亮这两位作家文学创作的

最高成就。

我一直认为，文学史不应是“自然发生史”，史家撰写文学史不能为了显示“别出机杼”、“与众不同”而随心所欲，没有标准，置学科的常识和众人公认的作品于不顾。文学史一方面要体现出史家的个性和别出机杼，与众不同；一方面又要尊重常识和共识，尤其不能否认文学经典的存在，更不能过于草率随意地选择作家作品入史。而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恰恰在这方面有可供商榷之处。此外，建构的概念范畴未能贯穿始终，与文本分析融为一体，也是影响该著取得更高成就的另一个因素。

【别处生活】技术精英可能的黄昏

尽管竞争和创新仍然存在，但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势力仍然显得不可阻挡。哪怕创业公司想到了大公司不曾有过的创意，大公司会迅速跟进，以自己庞大的现有市场逼迫创业公司，要么沦为次等角色，要么投降。护城河效应非常明显，大树底下，或许寸草不生。从消费者角度讲，服务的便利性，使得他们更难以逃脱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天罗地网。

在此情况下，技术公司尤其需要保持谦卑，因为，和此前的金融泡沫一样，也存在技术泡沫。金融泡沫的产生，是因为市场期待金融给予其特别高的回报，因此金融公司不得不发明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尤其是衍生品，来满足市场的需求，最后的结果是导致了金融危机。互联网平台公司需要意识到，它之所以有今天的这个规模，是因为围绕平台有大量的公司需要挣到钱，如果这些公司挣不到钱，平台公司本身存在基础在哪里？随着股票的估值越来越高，技术产业会感受到十年后华尔街所感受到的那种压力。

爱德曼公关公司每年调查四个类型组织的公信力，包括政府、企业、非政治组织和媒体，从调查结果来看，所有这些组织的公信力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在下降。爱德曼总结说：“一切都开始于2008年的大衰退，但正像海啸的第二波和第三波，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进一步削弱了全球化的信任度。后果是极为有害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，大众开始夺取精英的控制力。”今天的精英要看到历史上发生的一点，因为技术精英如果不把握好自己的机会的话，最后也会走入黄昏。技术精英需要保持谦卑，克服自己的认知傲慢。

【浮生半日】去哈佛

哈佛的自然环境很棒。Charles River环绕哈佛，两岸风景如画；Fresh Pond则在哈佛的西边，置身于浓密的山林和绿荫之间。这一河一湖，堪称哈佛的灵性所在。

其实再往西走，离哈佛稍稍近一些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很美的湖。我的居处后面的树林深处，有一条长长的自行车道。我很好奇，不知道这条究竟通往何处？有一次，我终于下定决心一直骑下去，果然一路田园风光，草地和森林的幽静处，就躺着神秘的Spy Pond。

哈佛的图书馆太强了，有读不完的书，读书太累了，就骑自行车沿着河边骑行。这有点像当年徐志摩在英国剑桥时活动，他的“性灵”正是在那个时候被打开的。

我研究的课题是后殖民理论与台港文学，主要活动于哈佛的三个地方：英文系、哈佛燕京学社和东亚系。英文系的霍米巴巴是当代后殖民理论的翘楚，以艰深晦涩出名，因此很神秘，也受到批评，不过我觉得其学说确有其独特价值。另外，读书的时候觉得艰涩，当面听课及参加讨论课的时候，却觉得较容易理解。东亚系的王德威是台港及中国文学研究的专家，哈佛燕京学社的杜维明则号称新儒学第三代表人物，这两位都中西贯通，声名昭著。我的关于霍米巴巴、斯皮瓦克以及台湾早期民族主义的几个课题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